

汤显祖 编年评传

—— 梁辰区 编



前海戏曲研究丛书

汤显祖编年评传

黄芝冈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显祖编年评传/黄芝冈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8
(前海戏曲研究丛书)
ISBN 978-7-5039-5644-7
I. ①汤… II. ①黄… III. ①汤显祖(1550~1616)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1060号

汤显祖编年评传



著 者 黄芝冈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吴氏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644-7
定 价 48.00 元

总序

郭汉城

“前海戏曲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即将付印，编委会要我写一篇短序，扼要地说明几个问题，帮助读者对编辑这套丛书的了解。

一

“丛书”的编辑，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中华艺文奖”有关。2011年12月19日，首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大会举行，我是23名获奖者之一。考虑如何使用这笔奖金的时候，就想到编辑这套“丛书”。当时想到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我从20世纪50年代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经过种种曲折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是以张庚同志为中心，戏曲艺术各个部门的一批史、论专家学者为基础的。我在这个群体中做了一些工作，就其主要成就而言，如《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等，都是集体攻关的成果。还有一些大型学术著作，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戏曲部分）、《中国戏曲志》，更凝聚着全国广大戏曲专家、学者的心血。所以中华艺文奖对我的奖励也包含着奖励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意义。把奖金用在编辑这套“从

书”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其二，当前戏曲仍处在“危机”之中，形势相当严峻。克服危机最根本的办法，在于增强戏曲本身内在机制的活力，发展戏曲在文艺生态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以取得在新时代生存、发展的权利。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深化戏曲改革，长期地耐心地做许许多多工作。“丛书”是密切结合戏曲改革运动的产物，其中涉及很多情况、很多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问题。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可以借鉴，教训可以警惕，都是克服戏曲危机、开辟一种新局面所必不可少的。当然，“丛书”规模有限，如果全国各地都来做这件工作，就有更大的整体性、实践性、科学性。

没有想到，我的这些简单想法，得到了各方热烈的反响。首先，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十分重视这部书的价值。对编辑方针、组织机构等作了细致、热情的指导，并给予了人力、物力、经费的援助。领导的态度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和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曲学会的领导也积极支持，主动提出承担“丛书”的编辑任务；文化艺术出版社承诺投入最优秀的、懂专业的编辑力量，保证“丛书”的出版质量。更使人感动的是“丛书”的作者们，都是九十、八十，最小也是七十以上年龄段的人了，他（她）们不惮老、不辞累、不怕苦，全心全意投入繁重的工作。有的作者本人已经不在，由家属、同事、亲友代替完成编辑工作。一句话，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鼓舞着每一个人。

二

以“前海戏曲研究丛书”为书名，专业性质很清楚，但前面冠以“前海”二字，则含义模糊，颇费猜测，特别容易与社会上、戏曲界很有争议的“前海学派”相混淆，需要做一点说明。

在长长的六十多年中，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戏曲研究的任务及研究集体的领导、研究人员的构成、研究机构所在地区等也是不断变换的，大致可以“文革”划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文革”前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阶段为第一阶段；“文革”后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阶段为第二阶段。“丛书”所辑入的著作，就出版时间来说，大体是第二阶段的最多；但就撰写的时间来说，大多是开始于第一阶段，定稿、出版于第二阶段。这种出版时间与撰写阶段不一致的复杂情况，若以阶段标志书名，都有偏颇，都不贴切。再三考虑的结果，还是采用第二阶段当时所在地——北京什刹海的前海比较合适，含义虽然模糊，却有更大的历史包容性，而且地名与书名结合，叫起来顺口，也符合习惯。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我们的出版经费不多，编辑力量有限，以地名作书名，也是编选范围的一种限制。

关于“前海学派”的争论，首先涉及一个对“学派”的认识问题。一个学派不是一个组织实体，也不是一种学术价值标准，其实质是共同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某种社会群体意识在理论上的反映。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引起人们思想上种种变化，也是各种学派及其争鸣最活跃的时代。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重要的学术争鸣，影响很大，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推动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前进动力。一百多年来的戏曲改良、戏曲改革，同样始终伴随着由社会变革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学术争鸣。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为它创造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发表出来，逐渐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的戏曲改革一开始就制定了“双百”方针，可惜没有贯彻；“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多改进，今天已经到了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东风”，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时候了。

三

依据以上的分析来衡量所谓的“前海学派”，我认为它已具备了成为一个学派的学术条件和特点，今后将在持续研究和百家争鸣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熟。这个判断是否得当，可以讨论。回顾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经过长长的六十多年的时间，曲曲折折的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不少学术成就，对戏曲改革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上、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缘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戏曲的历史、戏曲的现状。从时代与戏曲、内容与形式的交互作用的关系中，从戏曲这种程式积累型艺术与继承、变革的特殊形态的关系中，探求戏曲艺术发展的规律。而在各种关系中，人民群众始终处于积极、主导的地位，是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规律中最大的规律。运用这种观点，就把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虽然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现实研究条件有限，未能系统、缜密、细致、深入地贯穿在各个方面，运用于各种问题的研究，但由于我们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能够在某些方面突破前人的研究水平，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新的做法，符合戏曲在当代发展的需要。这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和一些文章上面。

2.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从大的方面讲，联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尊严，使学术群体有远大的眼光、崇高的抱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经受挫折的勇气；从具体方面讲，我们这个学术群体与“坐在书斋中研究”不同，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讨、观摩汇演、调查研究等活动。“开门研究”沟通了与地方的联系，有助于了解戏曲改革的整体面貌和存在的问题、群众的要求，这就提高了研究的实践性、针对性、群众性，尤其是能够在工作出现问题、偏差的时候，及时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这对于处在矛盾复杂、变化激烈的运动中的“戏改”是十分必要的。但中国戏曲剧种

繁多、流布广泛，活动方式多样，地区的历史、文化、群众审美情趣各异，从这个角度看，联系的广泛、深入地程度，就显得不够了。

3. 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不搞“一言堂”，不搞“领导说了算”，充分发挥研究人员自由、自主的研究精神。这种学术民主作风，更显著地体现在集体攻关的大型著作上。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专家、学者来自五湖四海，业务范围相距甚远，工作阅历、研究水平各有长短，学术观点也自难一致。这种情况对集体编撰很不利，不克服这个弱点，工作就难以进行；即使勉强完成任务，也难保证一定的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大力发扬学术民主，没有别的路可走。学术问题必须学术解决，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开展学术争论，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反复争论，求得认识上的一致。为了扩大学术民主，还邀请地方上的研究人员来作报告、讲经验、谈认识，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弥补我们的不足。经过种种艰苦的努力，才完成了任务，保证了一定的质量。正如戏曲界有的同志所说：“长时间在戏曲理论界具有主导地位，是与这个学术群体的学术民主作风分不开的。”

4. 重视学习，不断提高队伍的素质。学习丰富的戏曲遗产，学习先进的理论，学习前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学习戏曲改革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使我们这个学术群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与时俱进。对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骄狂失态。我们欢迎社会上的批评，认真听取，安排力量搜集、整理，准备将来修改参考。张庚同志常常提醒、告诫我们：“我们是边工作边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多么不易啊！”这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以上四个方面，既包括我们的成就，也包括我们的不足。但这些不足的存在，并不妨害它成为一个学派。任何一个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阶段性，都有局限性，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学派，这是客观世界不断运动、发展反映在认识上的必然，是永

恒的。只有顺应着这种规律，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才能不断超越阶段性的局限和认识上的不足。

四

在结束这篇短序的时候，我还想提一个设想。当前戏曲工作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关口，一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好形势，一边是现实存在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必须加强戏曲理论指导，深化戏曲改革，进行戏曲基本建设，从而走向戏曲复兴的目标。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我们有半个多世纪戏曲改革，乃至一百多年戏曲改良的实践经验可以做参考、借鉴。我们的工作能否取得成功，与有没有这个借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编辑“前海戏曲研究丛书”，主要也是为了总结经验。但规模小、力量微，形不成一种气势，如果全国各地的戏曲研究部门都来参加总结，相互参照，相互补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必将大大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戏剧理论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早日实现。

2013年10月6日

导 言

1956年6月里，我到了江西临川，在抚州专署新建房屋二楼住宿，可望见临川近郊景色。这时候正值江西雨季，四望葱翠，使人想到汤显祖诗“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玉茗堂诗·二京归觉临川城小》）的句子。我所到的地方是这位诗人和戏曲家的故乡，是景色清幽的江西地方。刘继庄在《广陵杂记》里称道江西风土，说“江西山水树木有超然远举之致”，可以“洗涤尘秽，开拓心胸”。在汤显祖的故乡，我初次感到他这些话亲切有味。因此，我对于这地方就深为爱慕，一直到今天写这篇序文的时候。

玉茗堂街离专署不远，我首先见到了街旁的“汤家玉茗堂”碑。我寻见汤显祖的故居是在雨晴散步的时候，不经意的遇合，真使我如获奇珍。碑立在一家住宅门的右方，立碑的时间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立碑的人自署“西蜀居士”。玉茗堂原是汤显祖沙井新居里面的一所建筑。新居落成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新居的地址在沙井巷里，沙井巷离玉茗堂街不远，可推知立碑地方也就在沙井新居附近。只是新居落成离立碑的时间已有二百七十多年，那时候的玉茗堂是汤家设宴演戏的地方，从汤显祖生前到他死后，都经常能听到堂上的笙歌。直到清顺治二年（1645），揭重熙、曾亨应等在临川起义抗清，被清兵围困三月，当时近城民居都被焚毁，几十里外都被清兵掳掠。等到城破以后，清兵在

城里驻防，汤显祖的沙井新居就被毁了。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陆格任抚州通判以后，汤寅祖的儿子汤秀琦才借助汤斌的力量，收回了他伯父的这所住宅，并由陆格重加兴建，作为汤显祖的祠堂，汤家玉茗堂就从此再建成了。据说新堂落成，陆格大会地方官吏，并由昆班在堂上上演出了汤显祖的剧作《还魂记》，也可知这所新堂仍和往日规模一样^a，这时候离立碑的时间也还有一百七十九年。再经过一些变迁，新堂只剩了旧址，清末的临川人也忘怀了这所祠堂了。立碑的是一位四川人，和汤显祖非亲非故，但因为和杜丽娘认做同乡，他却让汤家玉茗堂在它的旧址上留下这一点痕迹。这可算《还魂记》的最后一个掌故，也可说汤显祖剧作的精神不死。

在一个落雨的天气，和抚州市人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洗净了这块碑，并拍了两张照片。街道居民对这件事情感到有些奇怪，都来看热闹了。市委的一位同志对街道居民进行了宣传，并托他们对这件文物加以保护，因此就延长了这块碑的寿命。据街道居民说，他们正倡议修沟，这块碑将取作铺街石了。有一位老年居民谈到他少年时的见闻。据他说：“碑的前面原是一大塘，塘的前面原是一大坪，现在的马路就穿这大坪而过，可见清光绪时，这所遗址并不像今天这样局促。”

由市委的同志介绍了傅再希老先生。由傅先生的引导，凭吊了汤显祖的坟墓。汤墓在文昌桥（现名解放桥）下太平街十七号怡茂隆烟号屋后的小块隙地里面，墓地却早已平了，只剩下一块短碑和碑旁的两条石柱。这墓碑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立的新碑，立碑人是权知临川县事江召棠，他在两条石柱上面题写了“文章超海内，品节冠临川”两句话。江字云卿，桐城人，曾任江西上高、临川等县知县，在临川县的

^a ① 顺治二年清兵陷抚州，据《明史·曾亨应传》、《抚州府志》卷二十《兵卫志》，汤斌和汤秀琦联宗，据《临川县志》卷四十九之四《艺文》，汤秀琦《碧涧草》汤斌《序》。陆格就玉茗堂遗址建祠演戏，据焦循《剧说》卷六，康熙甲戌重刻《玉茗堂全集》汤秀琦《序》。

任内曾修建汤显祖墓。后来调任南昌县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昌教案起，江召棠被法教士包围在老贡院的天主教堂里面，逼勒他释放教民，枉杀百姓，江力争不屈，被教士用刀杀死。第二天，激起了老百姓的一场暴动，将这所教堂烧了，并杀死了几名英、法教士。^①江召棠是一位很有骨气的官，因此，就修墓立碑的人说，这墓碑和石柱也应当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物。

这地方原来是灵芝园，现在叫汤家山，又叫灵芝山，是汤家祖墓所在地，也就是汤显祖出生的地方。这地方原葬有许多坟墓，抗战的时候，日本兵在这里挖战壕，把这些坟墓都铲平了。汤墓得以保存，是因为烟店老板用竹篱把墓地圈入自己家里，想作为他自己的私有土地，并用这块土地做他晒烟叶的场所，用汤墓石碑磨他切烟叶的刀。由于他这一点自私的心，汤显祖的墓地和这块墓碑反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墓碑的右上角却平白地增添了磨烟刀的一处缺痕。我们问烟店的人，他们的回答干脆只一句话，说“这都是解放前的事情”，也就将毁损的一切责任全推开了。

在汤墓的右方西首是汤家祠堂的遗址，墓地左方东首有一藕塘，据说塘里藕种比别地藕种多一眼，别地藕种七眼、九眼，但这塘里藕种却有八眼、十眼，因为藕种好，藕味也就很甜，可算是一种特产。这一带地方原名汤家村，在汤显祖的沙井新居还不曾兴建以前，原是他父亲一辈聚族而居的地方。

但现在汤家的族人却散居在临川各地，和江西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相反。他们散居的地点有西津场（出西城八里）、榆坊场（出西城三十多里）、桐源圩（出西城四五十里）、云山场（出东城靠北四十五里）、丁村场（出东城）、湖口岗、白水场（已绝）、杨铁坑、杨铁坊、杨州坊各处地方。我曾在辟火焦汤钵子家、下璜村汤锦桂家借到两部文昌汤氏宗

^① 据六修《南昌县志》卷七七《官师》。

谱，方知汤家族人散居临川还不止以上所举的这些地方。

现在汤家的族人都是农民。据说清乾、嘉以后，汤家族里曾出了两位登仕郎；嘉、道以后，汤家族里出了一位武秀才。这说法虽不尽可靠，但汤族的人世代务农，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却是一个事实。

汤家族人散居各地和清初临川兵乱的关系很深，同时汤显祖的儿子又是复社朋友，汤季云毁去他甲申以后所作的诗，更应当和清初文字狱深有关系。可知从南明到清初一段时间，汤家子弟和族人曾饱受逃亡痛苦和政治黑暗的威胁。

因此，汤族的人对他家的这位祖先——汤显祖的印象一直就很淡薄。这情况在清嘉庆五年（1800）稍前就已经开始。破额山人的《夜航船》，是这个时候刊行的书，书里写到他的朋友严又茗曾到临川访问汤的后人，和这位汤的后人引起一场龃龉的事。他在这书里说：

亡友严又茗，明代至今五百余年，其所瓣香而心注者唯一汤若士，颜其堂曰：“又茗。”有荐之南昌幕中，主人调抚州，遂访临川汤氏后裔。得一副贡生，其人胡须满颊，腐气触人。又茗曰：“久仰玉茗先生清风亮节，不识玉茗全集外，还有几种遗书否？”其人曰：“客误矣。豫铭堂稿乃敝徒邵某所刻，仆为之批阅。尊驾所问玉茗堂集，舍下无书名，去问坊肆可耳。”又茗大哭。其家以为不吉，哄起一堂，几被诟骂。

南庐叔替这书作跋，认为这件事情并非“虚妄”。这时候，汤后人读书的还不知他家里有这样一位祖先，农家子弟就更不用提了。这事情并不是一件笑谈，却是件使人闷损的事。因此，我在这次访问回来，就认为对这位诗人和戏曲家的一生事迹有详尽加以搜集、介绍并进行研究、评论的必要。

汤显祖的家庭是一个衣食丰足的读书人家，在当时江西地主早已进行土地兼并的社会情况下，他产生在这个开明的中小地主家庭里面。因

此，他在二十九岁以前是一位不事劳动，不惯拘束，不大谙练世故，性情孤介，善爱高谈阔论，却又是一位长厚、质实、有洁癖和正义感的读书人。就在这个时候，他刻印了他的诗集《问棘堂邮草》。他的少年知友谢廷諒在这书的序言里，将这时候的汤显祖形象地刻出个轮廓来了。谢在《汤临川问棘堂邮草·叙》里说：

君气亮盖世，而常共于匹夫。长安长者多所知名，而州大夫或无半面。乡人有不能得其片字，而四方有识传宝其书。语帝王大略，激昂万乘，而不能说丘巷。足不识城府逵路，而好谈天下厄塞。料人物数千里之外，而常为眉目小儿所给。发策周历，谱冥律气，而手不能差量币物。娶妇十年矣，而袖无半钱，恶恶道至甚，而闻盗贼之死亦悲。幻提贵达，而石友无聊之士。儻而务分，人克后房，而居常不内反。拒绝人地，而好观名山川，寻师服食。此予有所解，有所未解也。

谢廷諒解不开汤显祖性情上、生活上、思想上的许多矛盾，因归结为“有所解，有所未解”，却不知生活在这许多矛盾里面是每一个封建统治下的开明知识分子都不能独免的事。汤显祖对乡绅地主（乡人）、地方官吏（州大夫）不肯随和；不爱和有名位的人们（贵达）交往，却爱和不得志的读书人（无聊之士）交好朋友；习惯过老百姓（匹夫）的朴素生活；对遭受压迫和敢于反抗压迫的老百姓（盗贼）寄予同情；看不起私人财产，时常没有钱用，也时常分钱给人：却都是他的好处。只是他对日常生活不肯留心，不能和老百姓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他的学问不从日用实践中来，因此流于空虚、理想——走向唯心超世的路；他时常谈一些帝王大略，兵家形势，只是他在放言高论里面，却同时蕴藏了一个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用世思想；他看不惯乡绅地主、地方官吏，更看不惯贵达的人们，但又想在仕途上一显身手，或是想遗弃世缘，走他的高蹈的路。就由于他的用世思想和他对社会的不满，使他在这两条路上摇摆不定，但他却想不

到有第三条可走的路。这一些却都是他的时代和他的阶级成分所给予他的限制，他自然无法解脱。

汤显祖从出生到十三岁，是权相严嵩执政的时候。从十八岁到三十三岁，是权相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严嵩和张居正是明代最有实权的两个宰相。当严嵩执政的时候，民间已经非常穷困，但他却威权独揽，贿赂公行，替明朝封建统治腐蚀、崩溃的悲惨命运扎了个深的根子。张居正原是个经济长才，只是他的施政却是以初明的独裁政治为目标的。他不知明太祖当时的种种措施，到他身死以后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太祖的统一对象是腐蚀、崩溃的元封津统治，但张居正却不想把腐蚀、崩溃的明封建统治做他的革新对象；他想让明神宗再造个明太祖的统治局面，但开明的言官们却要求他开放言路。张居正所支持的既然是当时封建统治的原有局势，因此，他不能不和当时开明力量造成对立形势；明神宗既然是当时腐朽政治所派生的一位君主，张居正久揽政权，他们间的总矛盾就终于爆发，张居正就因此倒下来了。

继张居正做宰相的是申时行、王锡爵一类人物，这些人都是些善于逢迎的老官僚，有的是张居正的短处，却没有张居正的长处。他们的政治措施只是逢迎取巧，更引导明神宗走向腐朽的路，他们把持政权、阻塞言路却又和张居正执政时代的作风一样。张居正和当时的开明力量既造成对立形势，就不能不引用私党来排除异己；他们却继承了这个传统来维持个人政权，再借助这些人贪赃进贿，营私舞弊，就因此加深了明朝封建统治的腐蚀崩溃，就因此更不为开明的朝士大夫所容。

张居正的政治主张虽不免和时代车轮背驰，但他却有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的政治抱负。他为了要施展他的抱负，才不愿放弃他取到手的政权，并不顾一切地排除异己来延缓他政权的崩溃。申时行、王锡爵一类人物却谈不到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他们借政权来投机取巧，把政权看成是私囊里的东西；他们没有政治措施，对国计民生都只是因循敷衍，对当时边患纯主和款，对全国灾荒漠不关心，对矿税扰民依违两可。他

们也一样排斥异己，但主要是权力的争夺，谈不到政见上的同或不同；也一样引用私人，却纯然是培植自己私党来和别人争权夺利。

因此，就张居正和反张的在朝士大夫说，还能够从政见的不同分出个是非、邪正；从申、王到沈一贯继起执政，党同伐异就渐和政见无关，内阁的更迭所争的只是权力，做官的人也大都此依彼附，幸进诡随。这时候，在朝的正人已日见减少，在野的清议就日渐高涨，明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崩溃已开始进展到不可收拾的最后阶段。沈一贯所培植的浙党小人为了作最后挣扎，就联合嵩、宣、齐、楚等小人党，不择任何手段，对在野的东林党人进行险恶攻击。当时东林党人斥小人党为小人，小人党斥东林党人为小人，就在这邪正相攻，纷如聚讼的政治情势下，汤显祖在临川隐居，就结束了他的一生。

汤显祖在二十八岁第二次进京会试的那年就尝到了仕途的苦味。这一年是张居正大权独揽已达到最高峰的一年，也就是张居正和言官们的矛盾总爆发的一年。前一年，刘台因劾张革职，到本年，张居正夺情事起，张居正这独裁政治家的面孔明摆在这富有正义感的书生面前，汤显祖对未来的政治生涯就不能不望而却步。汤显祖一面在发展他孤介的气质和高隐的情调，但一面却怀抱着浪漫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他曾在诗里说：“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他认为中国的事可由他轻而易举地大做一手，他认为做完了这一手再退隐也不为迟罢。因此，他在三十四岁中进士后就选择了南京太常寺博士的闲职做自己的退步，并作为自己的前进基础。但当时执政申时行、王锡爵一类人物，比起张居正来却一蟹不如一蟹，因此他只好选择礼部祠祭司主事做他的第二退步。这时候他很有闲时安心读书，但是他的心里却藏有忍不住的愤懑。他眼见追名逐利的一群人物，真好像漆黑的一群蝼蚁，如果和这群人长此纷扰，倒不如走“永割攀缘”的出世的路。

但现实却摆在汤显祖的眼前。申时行对万历十五年到十七年（1587—1589）的全国性的大灾荒熟视无睹，直到万历十九年才派遣杨文

举到江南经理荒政，杨到东南以后却无钱不贪，把地方灾情全都放在脑后。万历十八年洮州失事。申时行和边将贿赂。对边将的欺蔽进行庇护，而且他力主和款，只图苟安一时，却无意留心战守。十九年偶因小捷，边将大报战功，申时行却引以自居，并在他考绩的敕语里大书一笔。在全国性的大灾荒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救死不暇，朝臣们却争论着科场弊端，申时行的儿子是当时弊中的人物之一，因此，申时行就成了科场弊端的庇护人了。十八年洮河失事，万国钦劾申时行主和畏敌，通贿护私，既击中了申时行的要害，十九年又值星变，言官们更大有弹劾执政的机缘。申时行借神宗的谕旨反责科道诸臣，原企图用高压达到他钳制言论的阴私，却不防汤显祖针对着神宗的谕旨给申时行和他的私人们当头打了一棒。这时候，汤显祖面对现实。激起了难压抑的义愤，他那种“永割攀援”的消极情调刚发展到最高峰，却早被现实的光芒引向了恰相反的斗争的道路，由于他难压抑的义愤发出了震惊一时的论劾辅臣、科臣的有名的弹章。

汤显祖虽因为这本弹章被贬为徐闻县典史，但申时行和他的私人杨文举、胡汝宁等竟因为汤的一击完结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其他的执政私人也不敢露出鳞爪。这弹章的威力是非常大的，汤显祖却反因被贬漫游了广东的名胜，开拓了他诗人的胸襟。汤显祖到徐闻不久，就升任了遂昌县知县，他在遂昌施政却也是很可称道的。他营建了学舍和射堂，替遂昌县的文教设施打下了初步基础；他进行诛虎、缉盗，加强了遂昌县的治安保卫工作，并和勾结“隐民”的“富人”，“势人”展开了正面的斗争；他时常和当地读书人讲学问字，并和当地老百姓闲话农桑，陈说“天性大义”；他是个亲民的官，并能因“百姓所欲”安排他施政的方针；他能廉洁自持，并能够爱惜百姓。等到他施政三年，诸事就理以后，又敢于遣囚、纵囚；在深得民心的保障下，做了两件其他地方官吏所不敢做的事。他在封建王朝是属于循吏一类的官，他做官是为封建统治服务，这是无可疑的。他的文教设施是为了昌明礼教，他曾替封建统治者对老